

筆

上春秋

周永康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P

筆

上

秋

何永康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上春秋/周永康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7

ISBN 7-80661-014-6

I. 笔… II. 周…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893 号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自序)

这本书，是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写的稿件，包括业务体会和具体报道内容两大部分。在这篇序言里，我想联系自己这 20 多年来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来着重谈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记者怎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简单地说，也就是记者怎样讲政治的问题。

记者怎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但从总的来看，这个问题对一些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记者、编辑同志，特别是经历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老记者、老编辑来说，似乎都已没有必要再来重提这个人所皆知的老问题。但如从今天来看，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后，这个“记者怎样讲政治”的问题，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其他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样，也大有重新研究探索一番，从而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的必要。

就我而言，从事新闻工作也差不多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之所以还要在今天花些笔墨再来议论一下这个“记者怎样讲政治”的问题，因为我深感这个问题的现实迫切意义。为了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自己近年来获得的一个“雅号”来谈些体会。我记得早在 10 年前，有些同志就对我这个新华社“老兵”作过一番评论，认为与其说我是

一个报道工业建设的经济记者，倒不如说我是一个注意社会动向的“政治记者”。最近几年，有的同志干脆简单地把我说成是一个专门说“不”的“不记者”了。

听到这个“雅号”，再仔细思考一下，说我是个“不记者”，倒也并非没有根据。这20年来，我在各地报刊上所发表的各类新闻稿件中，“不”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确实相当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头两年内，党在落实各项政策中，就有人认为当时的某些政策都是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等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针对这一问题，我通过一篇报道，明确地指出：不，这些政策的落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党的十二大召开后，进一步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人却又认为这样一来，工人的地位就不如知识分子了。对这个思想问题，我也再次用事实来说明：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人的地位并没有降低。后来，社会上有些人片面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过是让大家多捞点实惠，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不过是“实惠主义”而已。对此，我在专门采写的一篇报道中作了回答：不，社会主义是要给大家带来种种实惠，但社会主义不是实惠主义。实惠主义是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代名词，必须予以批判。另在雷锋精神今天是否已经过时，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否在当苦行僧等等问题上，我同样发出了一系列的“不”，从而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提高了报道的政治思想水平。

我从70年代底开始，在宝钢一共采访了10年左右时间。对这个中外瞩目的、争论十分激烈的特大工程，说的

“不”就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当时，有相当多的同志一再认为建设宝钢在决策上是完全错误的。我说“不”。宝钢作为集世界各国冶金先进技术之大成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如在决策上有什么问题，那不是该不该建，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主要是当时脱离实际，操之过急。后来事实也证明，经过调整，宝钢很快就走上了稳妥发展的道路。到了1985年秋天，正当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之际，全国各地大学生在学潮中纷纷指责宝钢花了“好几百亿”，买回来了一堆“废铜烂铁”，上了日本人的当。正在这时，我更以一个“知情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发表的通讯中，在同各地大学生代表的交谈中，毫不含糊地说：“不，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好几百亿”、“废铜烂铁”之说，纯属误传。最近10年间，我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说的“不”，份量就更重了。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搞不好了”，有的人甚至感叹“中国搞不好了”。在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我都采取探讨分析的方法，对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不”，来个否定之否定，反复地说了另一种“不”，从而说明不管是小到一国企也好，大到整个国家也好，只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把改革深入地开展下去，把腐败坚决地遏制下去，都是完全可以搞得好的。

从这20年的实践中，从我所强调的这些“不”中可以看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鲜明特点，这便是记者如何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敢于面对当前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动向，不回避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忧虑乃至歪曲、攻击，敢于碰硬，敢于触及时弊，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报道。所谓

“不”，也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抱消极的、否定的态度，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而又实事求是地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通过研究、探讨、分析来分清是非，认识本质，明确方向。该肯定的必须充分肯定，该否定的必须彻底否定。也决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而是让人们更深地了解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增强理想信念，推动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界许多老前辈过去一直十分强调：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应该毫不含糊地提出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特别是在政治上，一定要旗帜十分鲜明，立场非常坚定。但这些年，一些是非观念被搞得颠颠倒倒，模糊不清了。应该发扬的优良传统、道德观念，被搞乱了、否定了；应该抵制的丑恶现象，反而沉渣泛起。某些报刊所刊登的报道，不但不能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客观上反而起到了一种教唆犯罪的作用。

当然，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完全有可能会被人在背后（甚至当面）指责为“跟不上形势”、“在搞极左一套”、“思想处于僵化”……我也承认，在这本《笔上春秋》拙作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和行动，同当前社会反差的确很大。但这没有关系。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愿因为自己观点同当前一些潮流“格格不入”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相反地，我不但不想随波逐流，而且还要对当前社会上我认为属不良倾向的种种现象，继续把“不”说下去。我还认为，围绕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可以有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声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映。但关键是要通过讨论研究甚至争论，从政治

上分清是非,辩个明白。如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我们确实吃过不少“左”的苦头,今天仍然要防止“左”的倾向重新出现。但放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些什么性质的倾向呢?现在时代确实不同于过去,但还有没有出现“左”的新动向呢?除了“左”,还存在不存在右呢?如果不存在右,那么在报刊上不时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又是属什么性质的倾向呢?在这些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为舆论阵地上尖兵的记者、编辑们,能不认真思考、关注么?如想回避这些问题,那又怎么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又会走到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去呢?

最近,我重温了胡耀邦同志 15 年前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次题为《关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发言。我深感他讲的那些话在今天更值得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深思。他说:“能不能把党的新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说是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照样来办呢?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很不确切的。”他还强调指出: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如把胡耀邦同志 15 年前讲的这番话,来对照今天的现实的话,那最近一个时期,在新闻舆论这个阵地上,认为新闻是商品,要商品化,鼓吹新闻自由要冲破枷锁的专家、学者却不乏其人。记者、编辑个人以及整个报刊宣传,应该坚持怎么样的方向?在这场争论中,谁又能采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立场呢?而这场涉及政治方向的争论,又是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各样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相

互配合,遥相呼应的。我们又怎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呢?

不过,有一点同样十分必要加以澄清。我们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指政治方向而言,不等于强调了政治方向,就要恢复到原来的一套“左”的轨道上去,而不需要进行新闻改革。当然,新闻改革如何进行,如何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把报纸办得更受人欢迎,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单就趣味性、可读性来说,也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即令本身是正确的东西,要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使人理解,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也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并且要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但在当前,有些记者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差距。有的稿件空话套话连篇,有的稿件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究其原因,既有记者本身的素质问题,也存在着上级领导的旨意问题。记者也只能奉命作文,完成“任务”。而这些现象,我认为恰恰正属新闻改革的范围。

至于记者的素质,我认为也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可分割。今天,有的记者一方面在笔下大讲特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一方面却嫌被报道单位所送的红包里钱太少,要对方加个倍才能见报,等等。个别记者不但把新闻当作商品,连自己人格也可变成商品,待价而沽,最后走向反面,毁了自己前程。这些情况也已不足为奇,不屑一谈。但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真正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新闻工作者,在他身上会出现这种两副面孔、双重人格的现象吗?

总之,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还处于“初级阶

段”，但在新闻舆论阵地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时刻。对我来说，仍将在今后一如既往地针对一些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错误现象，继续保持说“不”的态度，也欢迎同志们对我所说的一些“不”，同样提出一些“不”，帮助我进一步澄清是非，提高认识。

这篇自序，就算是我这个“不记者”的一篇“独白”吧！

周永康

2000年5月1日



作者简介

周永康，1930年7月11日生于上海。1949年初毕业于上海晋元中学，入大夏大学攻读法律。同年9月，考入圣约翰大学。1952年于新闻系毕业后，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部训练班学习。次年夏天，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从1953年9月份开始，除十年动乱外，一直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担任记者。在五六十年代，曾先后参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炼钢铁、技术革命、全国赶上海等战役性报道。1978年后的10年间，曾负责宝钢工程的宣传报道。1986年，全国首次实行新闻专业职务聘任制中被聘为高级记者。次年，又受聘兼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特约研究员。在八九十年代，还曾在北京参加《半月谈》杂志的创办工作，曾在海南省海口市创办《环球经济导报》，并任报社社长。从1993年开始，先后担任《上海经济报》、《上海企业家》等报刊顾问。进入2000年，又担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40多年来，周永康采写了2000多篇新闻、通讯、特写、工作研究、调查报告、社论短评等作品。其中如《“太平

洋”的风浪》、《国家在她们胸中》、《宝钢——中国现代化的“钢铁婴儿”》、《上海住房问题调查》、《长江三角洲纵横谈》以及有关国企改革的系列专栏随笔等稿件，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60年代前期，还以“南方”、“史碧”等笔名，在《解放日报》副刊、《收获》文学刊物上多次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

十年动乱中，周永康被长期强制劳动，一再遭受迫害。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才得以重新恢复记者工作。最近20年间，除采写新闻报道稿件，并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齐齐哈尔、绍兴等地讲课40多次。1983年，周永康由于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作出显著成绩，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1986年11月，周永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担任民盟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从1988年到1997年10年间，曾担任上海市政协第七、八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第九、十届常委兼副秘书长，并被选为民盟第六、七届中央委员。

目 录

第 1 部分

春风初起

5 我是怎样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兼谈当前报道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28 上海钢管厂开展“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的各项政策，究竟为哪些人的利益服务”的讨论

32 上钢二厂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带来了七个方面的变化

35 父与子

——上海一个老工人的家庭纪事

39 竞争靠价廉物美还是靠请客送礼？

42 发展自行车工业要热中有冷

45 调整舞台上的一出好戏

——上海矽钢片厂见闻

52 上海冶炼厂从 30 年实践中得出结论：奖金不是毒害工人的“腐蚀剂”，而是加速四化的“催化剂”

56 他们为什么不要这笔钱？

——上海针织九厂针织车间纪事

58 上海市化工局从流通环节中挖掘出大量建设资金

60 这个“表面”文章为什么这样难做？

64 笔上春秋

——访建厂 50 周年的上海英雄金笔厂

69 “英雄”三部曲

75 信任与偏见

——上海一位老工人的两种不同遭遇

第 2 部分

再沐朝阳

85 有声有色地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

——再谈当前报道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137 上钢三厂宣传干部划清十二大提出“翻两番”与
“高指标”的界线

142 工人的地位不如知识分子了吗？

——记上钢二厂干部学习十二大文件的一
次专题讨论

148 一张耐人寻味的表格

——记上海异型钢管厂怎样讨论“翻两番”

153 多栽树 多赶路 多爬坡

——记上海矽钢片厂党员联系思想学习十
二大文件

157 究竟是“过分”还是“本分”？

——记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一厂党员的讨论

162 在《紧急通知》发出后发生的事情

165 上钢二厂通报批评一位副厂长 教育全厂干部

抵制请客受礼风

169 上海矽钢片厂厂长宋浩对部分产品自销问题的

看法和建议

173 在 3000 多份合同的背后

——从上海异型钢管厂看各地的可喜变化

176 无形的能源

——来自上钢三厂的一张“能人谱”

第 3 部分

企业纵横

193 企业·企业家·企业家之“家”

——十三大前后有关改革报道的一个
侧面

203 摆脱困境更显出改革的威力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一

206 岂能满足于当一个开明书记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二

209 正确处理文凭与水平的关系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三

212 出口企业要与出口效益挂钩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四

215 改革应该促进老厂技术改造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五

218 从一笔没有成交的买卖谈起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六

221 跨地区实行联营要稳妥可靠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七

224 在“飞乐”股票大受欢迎的背后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八

227 没被人们遗忘的“十八条汉子”

——上海企业改革采访札记之九

230 省了小钱,丢了大钱

233 一个厂长的苦恼

236 春潮急

——在竞争激流中前进的淮海制药厂

243 两家毗邻企业为何难以实现拆墙兼并?

246 雷锋式的标兵现在过时了吗?

——记上钢五厂的一场讨论

252 社会主义不是“实惠主义”

256 分清“滥发”与“该发”的界限

——上钢三厂发给一批科研人员 18,000
元奖金

263 造就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企业家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侧记

269 腾飞吧! 雄鹰

——记上海英雄金笔厂厂长赵松生

279 牛鼻子

——沈巧福和“资金三部曲”的故事

289 一位注重“感情投资”的厂长

——上海市优秀厂长贾炳灿的治厂之道

296 企业家的第三个“家”

——记上海“金三角”企业家俱乐部

301 一个重新组合的“大家庭”

——记跨地区的民间行业组织“东铁协”

第4部分
重中之重

313 遵照十四大精神把国有企业宣传继续引向深入

——记两个独具一格的经济随笔专栏

322 从总书记的两次考察谈起

——从上海看中国企业之改革(一)

326 困难大不等于要搞私有化

——从上海看中国企业之改革(二)

330 必须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有企业究竟搞不搞得好”析疑之一

333 且看今日“百万雄师过大江”

——“国有企业究竟搞不搞得好”析疑之二

336 能怪他们“蛋糕”越做越小吗?